

“素质教育”与转变教育资源配置方式

“Quality Education” and Pattern Changes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Distribution

吴 华 罗海萍

(杭州大学教育系, 杭州 310028)

为克服“应试教育”现象而从实践中概括形成的“素质教育”概念,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国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教育理论界对“素质教育”也开展了长达10年之久的广泛讨论。可以预见,“素质教育”将成为我国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取向,并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发挥基本“范式”的作用。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实践“范式”,在实践推进过程中必须以观念转变为先导,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如何才算是实现了“观念转变”呢?从已有的论述来看,似乎只要认识什么是“素质教育”和赞同“素质教育”就算是完成了观念转变,而对于观念转变必须通过相应的行为模式来验证和反映这一更具实证性的问题则缺乏深入的探讨,从而削弱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在“素质教育”三大核心观念(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健全个性,实现全面发展)中,“面向全体学生”看似最简单,其意也不言自明,因此在有关论述中也常被一言带过。实际上,“面向全体学生”这个问题,无论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中,还是实践活动中,都还远远没有解决,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反映了推进“素质教育”的艰巨性及其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一、“面向全体学生”和“面向全体学校”

“面向全体学生”是教育界高喊的口号和高举的旗帜。“全体学生”的概念,对教师而言是“全班学生”,对校长而言就是“全校学生”,对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则是“全乡(县、市、省等)学生”,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只把它当成是教师的行为准则,却忽视了对于教育行政部门同样也有一个“面向全体”还是“面向部分”的问题需要解决。从“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提高全体国民素质的高度来重新审视“面向全体学生”这一口号,毫无疑问,只有当校长和教育行政部门也把它作

为自身的行为准则时,“面向全体学生”的“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掌握着教育资源配置权力的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转轨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在教育行政部门这个层面上,“面向全体学生”必须通过“面向全体学校”才能实现。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而言,“面向全体学生”,就是要尽量缩小辖区内每一个学校在办学条件方面的差距,以保证辖区内的每一个学龄儿童,无论他在那一所学校就读,都具备大致相当的发展条件。也就是说,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资源配置中,应该建立和贯彻执行一种平等对待每个学生——通常以平等对待每个学校的形式体现——的教育资源配置政策。否则的话,学校之间不断增大的办学条件差距将使“面向全体学生”进而提高辖区内全体国民素质成为一句空话。

以此来衡量目前各个层次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资源配置政策,其非“素质教育”导向乃是一个显见的事实。在各个层次的“重点”和“非重点”学校之间,每一次教育投资不是缩小了它们之间在办学条件上的已有差距,而是相反,结果是只有不到10%的学生获得了“素质教育”的更好条件。目前在全国各地自上而下开展的名目繁多的“百校”、“千校”工程及与此配套的投资倾斜政策就是明证。

为投资倾斜政策所作的主要辩护理由是所谓的“保证重点”和“提高投资效益”。其实这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是为了提高升学率而“保证重点”则算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因为必须为最有可能升学的学生和最具潜力提高升学率的学校提供最好的条件,升学率的提高才有保证。现实中人们也正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反之,如果教育的价值取向是“面向全体学生”,“保证重点”就成为不合理的选择,在实践中也就毫无必要了。因此,在教育投资的配置上是否要执行“保证重点”这一类政策,就成为区分真想“素质教育”还是假想“素质教育”的重要标志。

通过倾斜投资,实现“重点保证”,真能够“提高投资效益”吗?这首先要看我们对“效益”如何理解

了。如果“效益”是以提高全体国民素质来衡量,投资倾斜政策就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如果“效益”是以升学率或者以“尖子学生”数量来衡量,那么,“保证重点”的投资倾斜政策恐怕就是“最优选择”,至少是一种“满意选择”,这也正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教育投资政策。

对经济学的滥用是在教育资源配置问题上制定和执行不合理的教育投资倾斜政策在认识上的重要原因。“投资优势产业、启动产业链条、产生关联效应”,这一对促进经济增长行之有效的思路,对发展教育并不适用。经济效果的即时实现、循环增值、社会共享等特性,在教育活动中并不能得到体现。凝聚在每个学生个体身上的教育效果——个体素质的提高,一般是不能转移到其他个体身上的,这一点在同代人之间尤其如此。正是教育效果和经济效果之间的这种本质差异,决定了真正的“素质教育”与教育资源配置上不合理的教育投资倾斜政策是完全不相容的。因此,如果我们是真想“素质教育”,那么,改变目前这种不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教育资源配置的“非歧视原则”和“平台模式”

没有宏观上“面向全体学校”的“素质教育”。而仅仅着眼于微观上个别学校内部的“素质教育”,对于提高全体国民素质就不可能有太大的社会价值。而且,由此传递的非平等的价值观,究竟是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还是不利于提高国民素质,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来判断,其结论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要推行“面向全体学校”的“素质教育”,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就必须贯彻“非歧视原则”,即对所有学校一视同仁的原则。当然,这里所指的“所有学校”,一般只能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辖区和辖区内的投资对象学校为限。所谓“一视同仁,就是任何学校都不应享有投资特权,包括人、财、物各个方面,标准相同,机会均等。学校之间在获得外部资源上的差异只应产生于它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包括教育效果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这种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我们称之为“平台模式”,与目前向重点学校倾斜的“山峰模式”恰成鲜明对照。

按“平台模式”配置教育资源,学校之间将会逐步缩小其在资源上的相对差距,并为缩小其间的绝对差距创造了条件,使辖区内在不同学校就读的学生都能享有大体相当的教育条件。

按“平台模式”配置教育资源对于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贡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受益人数增加。比较两种不同的资源配

置方式,“平台模式”可以使所有学校或者同时增加投入强度,或者在一个有限时期内轮流增加投入强度,无论实际施行哪一种具体形式,都将会有更多的学校分配到更多的教育资源,从而使得在资源投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有更多的学生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平台模式”对教育资源的配置,在遵从“非歧视性原则”的同时,也是效益导向的。只是这里对“效益”的评价,根据前述对“教育效果”和“经济效果”之间的比较分析,学生人数将成为效益评价的重要权重,追求“规模效益”也就成为学校的内在需要。在此基础上,任何可以明确评价学生素质及其增量的指标,也将成为影响学校之间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从而在学生发展和学校发展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联系,使“素质教育”成为学校的内在需要。

第三,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约束机制。目前以倾斜投资为特征的“山峰模式”在学校之间配置教育资源时,在相当程度上是凭主观决断的,这就使得在总体上,决策失误成为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平台模式”则不同,所有学校具有平等地位,资源配置严格按照相同的标准进行,学校除了拿“效益”换“投资”以外,没有别的特权。管理部门也因以明确的资源配置原则及其实施细则作为工作规范,在行动上支持了“素质教育”。

第四,有利于提高教育资源的共享化水平。按“平台模式”在学校之间配置教育资源,在理论上会遇到配置不足和配置过度的问题。解决此类问题,一是可以采用前述轮流受益的办法,在一个计划期内,使所有学校逐个或逐批获得高强度的有效配置;二是运用系统工程的思路,在校际之间建立共享的实验中心、图书中心、活动中心及其它各种资源中心。在资源总量不足以同时满足大家需要的前提下,提高资源的共享化水平,使增加投资强度和增加同时受益学校数量的矛盾得到有效的解决。这种共享模式如果纳入社区发展整体规划之中,还可以更加有效地吸引社会资源投入于教育发展之中。

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平台模式”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将会有更多的教育资源从“学校所有制”中游离出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为全体学生所拥有,“面向全体学校”的“素质教育”也就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三、班级教学中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

在学校层面上,我们完全可以改变现行教育资

(下转第 23 页)

个基因 *ced1*~*ced15* 与细胞凋亡密切相关。其中, *Ced3* 与高等哺乳动物的 ICE 基因同源, 可启动凋亡; *Ced9* 与 *Bcl₂* 同源, 可抑制凋亡。

细胞凋亡基因: ICE 家族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基因, 其代表成员白细胞介素 1 β 转化酶基因 (ICE) 位于 2 号染色体, 由 7 个外显子和 6 个内含子组成, 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据推断可能是通过降解 poly (ADP.ribose) 聚合酶诱发染色体断裂导致凋亡。此外, 有些抑癌基因如 *myc*、*P53* 和 *Rb* 等也可引起细胞凋亡。

抑制凋亡基因: *Bcl₂* 是抑制细胞凋亡的基因, 位于 18 号染色体长臂 21 区 (18q21), 由 3 个外显子和 2 个内含子组成。目前, *Bcl₂* 已形成有 10 个成员的家庭。

近来发现, 一些原癌基因、病毒基因也有抑制宿主细胞凋亡的作用。因为凋亡的分子调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网络过程, 有许多因素和许多环节尚待开展研究。

5. 趋化因子基因

随着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近年来获得了大量结构高度同源、功能相近的细胞因子, 称之为趋化因子 (Chemokine), 目前已有成员 20 个, 构成趋化因子家族。它们大多是能与肝素结合的多肽, 主要由白细胞分泌。根据其半胱氨酸残基的排

列方式、基因定位以及生物学功能, 分为 α 和 β 两个亚家族。

人的 α 亚家族的趋化因子基因定位于 4 号染色体的长臂 (4q12—21), 如其成员 IL8 基因含有 4 个外显子和 3 个内含子, 其开放阅读框架上游为 Hogness 序列 (TATAbox), —100~—94 为转录因子结合位点, 在 —126~—120, —946~—937 分别为 AP—1、AP—2 结合序列, 还有糖皮质激素调节序列、增强子序列和 IFN— γ 调节因子—1 结合序列, 以及下游的 cAMP 调节序列, 说明 IL8 的产生, 受其基因的严格调控。

人的 β 亚家族的基因定位于 17 号染色体长臂 (17q11—21), 其成员 MCP—1、MIP—1 α 、MIP—1 β 均含有 3 个外显子和 2 个内含子。

由于趋化因子能引起细胞的定向迁移, 是细胞浸润、淋巴细胞再循环、组织定位、归巢等效应的重要介质; 可活化靶细胞, 使其脱颗粒, 释放炎症介质, 介导炎症反应; 还具有抗肿瘤功能。因此, 对趋化因子的结构、功能以及基因调控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应用价值。

总之, 上述有关功能类基因研究的深入和进展, 对阐明基因表达和基因调控的机制, 拟定对人类疾病基因治疗的战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责任编辑 蔡德诚 王宏章)

(上接第 48 页)

源配置方式。显然, 选择“平台模式”, 通过“面向全体学校”即可为“面向全体学生”提供宏观政策环境, 可惜我们长期忽视了这种相关性。而在教师层面上, 当我们大声疾呼“面向全体学生”时, 却又很少有人去认真考虑它在班级教学中所面临的真正实际困难。

与学校之间以物质性资源 (货币也是一种物质性资源, 只不过是一种抽掉了具体使用价值的物质性资源; 因而可以作为一切物质性资源的等价物) 配置为主不一样, 在教学活动中, 在教师和学生之间, 教育资源配置的核心是信息资源的配置。由于信息资源的价值因人而异, 它不象一台电脑无论放在哪个学校都是一台电脑, 也不象 100 万元教育经费无论由哪个学校到市场上都能买到同样的货物和劳务, 同样的信号对于不同的学生一般具有不同的意义。于是, 在教学过程中, “面向全体学生”就不仅仅是转变教育思想的主观意愿问题, 它还受到班级教学过程客观属性的挑战。什么是“面向全体学生”?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发展这个角度来看, “面向全体学生”就是要为每个学生提供最适宜的发展条件。然而, 由于个体间差异的普遍性, 在班级教学中, 一般来说, 教师的任何一种教学决策 (教学序列安排、教学条件设置等)——教育资源配

置方式, 都会因为不可能适应每个学生的特殊需要, 从而使得“面向全体学生”——让每一个学生都实现最大可能发展——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教师都面临着“教师应该面向谁?”的困难选择, 即以哪一种学生发展水平为参照系建立相应的教学序列。根据前面的分析, 无论教师最终选择了“谁”——某一学生发展水平作为班级的“代表性学生”, 都是以“非代表性学生”偏离最佳教学状态为代价的。因此, 在班级教学中, 贯彻“素质教育”思想的现实选择只能以实际的“面向大多数学生”来取代理想中的“面向全体学生”了。

认清并承认“素质教育”在班级教学中所遇到的这一内生障碍是令人遗憾的, 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个结果与热力学中关于“永动机不可能”的命题, 在指导我们行动方面具有同样的价值。

从资源配置角度来审视“素质教育”的内涵和所面临的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 效率就无从谈起; 而在教育学当中, 它不但是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核心问题, 同时也是实现教育平等的基础问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很多良好的愿望就有成为空谈的危险。

(责任编辑 肖庆山)